論科學工作中的批評和自我批評

尤·日丹諾夫著 何思源譯 龔育之校

在我們祖國的科學家面前，擺着偉大而光榮的任務，那就是去認識我們週圍的自然界並掌握它的規律性，以求應用這些規律為蘇維埃人民謀福利。在這樣的道路上，祖國的科學會得到了不少的成就。蘇維埃學者的知識、毅力、智慧和志願，正用來完成黨和政府對科學所提出的巨大任務。蘇聯的學者正積極地參加實現在工業和農業經濟中技術進步的工作。動力學家、水利學家、建築學家的創造性的思想，正加緊地解決有關實現斯大林偉大共產主義建設的各種任務。對於在廣大領土上改造自然的巨大計劃，生物學家、土壤學家、地理學家和水力學家，正進行着有成就而緊張的工作。蘇維埃地質學家愈來愈多地在祖國土地中發現無窮的富源。在我們祖國創始了並且發展了先進的米邱林生物學，開闢了動植物定向改造的道路。說明大腦活動基本規律的巴甫洛夫學說，為祖國的生理學在世界科學中獲得了領導的地位。

在解決最複雜的科學問題中，蘇維埃物理學家獲得了偉大的成就。英美原子外交的製訂者，在擬定他們的政策時，在最後的計算中不能指靠我們物理化學方面的弱點了。美國原子工廠的工程師之一D·賀格爾頓，和多年來因充任華盛頓國防部的“俄國經濟問題”主要顧問而號稱“俄國專家”的E·雷孟德，在他們所作的“俄國什麼時候能有原子彈？”小冊子中，得到結論說：“俄國也許可能於1954年投出第一枚原子彈。”

斯大林同志答“真理報”記者關於原子武器的談話，證明了戰爭販子希望獨佔原子彈的荒誕，並且顯示了蘇維埃科學和技術的卓越成就。

共產主義建設的每一步都在蘇維埃科學家面前提出了日益複雜和重要的任務，而科學研究上的每一成就也都在打開着新的更為寬廣的眼界。

解決在科學面前所提出的問題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久經考驗的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斯大林同志在他關於語言學的著作中，規定了這個方法對於一切知識部門的意義。斯大林同志指示說：“誰都承認，如果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沒有自由的批評，任何科學都是不可能發展，不可能進步的。”

布爾什維克黨在秘密工作時代，在革命鬥爭時代，是在列寧、斯大林的領導下，用自我批評的武器鍛煉出來的。列寧分析革命鬥爭的歷史時說：“從前所有一切革命黨陷於滅亡，就是因為他們自傲，而看不見自己力量之所在，害怕說出自己的弱點。而我們是不會滅亡的，因為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弱點，並且能學會克服弱點。”（“列寧全集”第33冊278頁）

自我批評——這個特點是屬於作為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而鬥爭的戰士的布爾什維克黨的。認識工人階級事業的正義性，基於嚴格科學分析確信其勝利，感覺在人民大眾面前所負的責任，這一切就決定了發揚這種真正新的人類品質之必要性和可能性。斯大林同志強調地說：“不能把自我批評的口號看作一種轉瞬過去的和倏忽即逝的東西。自我批評是一個特別的方法，是以革命發展的精神一般來教育黨的幹部和工人階級的布爾什維克方法。馬克思早就說過：自我批評是鞏固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至於說到我們黨內的自我批評，那末，自我批評的開端是在我國布爾什維克主義開始出現時起，即在布爾什維克主義作為工人運動中一種特別革命派別而產生出來的最初幾天起的。”（“斯大林全集”第11卷127頁）

自我批評方法是從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特徵中產生出來的。斯大林同志教導說：舊東西與新東西間的鬥爭，衰亡着的東西與產生着的東西間的

鬥爭，便是一切發展過程的實在內容。自我批評是自覺地把這個辯證方法的特徵運用到生活之中，意味着這種規律性的實際掌握和把它應用於實際事物上的能力。批評和自我批評要和教條主義、經典主義（達爾木得主義）現象以及讀經態度對待理論作鬥爭。

科學中自我批評決不是不信任科學，不信任科學的力量。科學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堅固磐石上的：馬列主義哲學對於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的關係問題，給予唯一正確的解決，指明了在無窮的認識過程中怎樣由於部分的、不完全的、局部正確的知識和理論產生出來對於事物更完整的認識。科學工作者研究這種或那種問題，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結果，所得到的不是完整的，不是絕對的，而僅是部分的，相對的真理。而工作在這裏並沒有終止，僅僅是完成了它的一定階段。對於已經獲得的結果，採用批評態度就是暗示着應當照什麼方向更向前進。列寧在他的天才著作“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曾寫道：“這樣，人的思惟，按其本質來說，是能夠給與並且給與着我們以絕對真理的，絕對真理是由相對真理的總和構成的。科學發展的每一階段，在這絕對真理的總和中添加了新的幾粒，可是每一科學原理的真理界限是相對的，它們是隨着知識底往前發展時有擴張，時而縮小的。”（“列寧全集”第14卷122頁）

由於發展的過程不僅必需與舊事物的衰亡相聯系，而且也必需與新事物的產生相聯系，因而布爾什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便是以創造的、建設的精神為其特點的。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強調了：辯證法並不是純粹的否定、無謂的否定、懷疑的否定、動搖、疑惑。列寧無情地評擊了和揭露了各種機會主義者的腐蝕性的、毫無結果的懷疑主義，這種懷疑主義迷惑着無產階級的意識，取消了無產階級鬥爭的鮮明目標。在“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並論‘帝國主義的經濟主義’”論文中，列寧憤怒地攻擊Π·基也夫斯基。因為基也夫斯基迎合當前的機會主義的遁辭，主張拒絕無產階級任務的肯定的口號，而用似乎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否定的”口號來代替。列寧在這一點上指出：“社會民主黨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種‘否定的’口號，這種口號只是用來‘使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的意識

尖銳化’，却並不同時肯定地回答，當社會民主黨自己掌握政權時，將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否定的’口號，與確定的肯定的解決沒有關聯，並不能使意識‘尖銳化’，倒是把意識磨鈍了，因為這種口號只是一個空殼、空洞的叫喊，沒有內容的聲明。”（“列寧全集”第23卷第59—60頁）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始者，他們全部的批判性的著作，都是以對爭執不決的問題作出新的肯定的解決的方式寫成的，同時還深刻地研究了科學中的許多新問題。馬克思的“資本論”以“政治經濟學的批評”為副題，但是這部偉大的著作不只是簡單地批評了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學說，主要的是對於社會發展中根本的、生死有關的問題，給予了真正科學的解決。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也完全沒有局限於揭發杜林的錯誤，而是闡明了並發揮在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學說中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

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的偉大處，就在於這本書裏布爾什維克黨的創始者利用對資產階級哲學的批評，達到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中重要問題的再向前發展的目的。

斯大林同志在“無政府主義呢？還是社會主義？”一書中，不只批評了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也在思想的和政黨的鬥爭問題上，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在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中，斯大林同志不只給馬爾及其“門徒們”的反科學觀點以粉碎性的批評，同時也解決了語言科學中的基本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是具有建設性、創造性的。研究社會生活的新事物，概括無產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鬥爭經驗，在這些基礎上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列寧和斯大林提供了光輝的模範。無產階級的領袖反對以教條主義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在批評和自我批評上也提供了光輝的榜樣。凡是志願在科學的任何部門中擴大認識的人們，都應效法這些榜樣。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新的、前進的事物反對舊的、垂死的事物的鬥爭，是一切發展的基礎。並且，辯證唯物主義並不是簡單確認這一最重要的規律便算了，它要求積極地站在新事物的方面向舊事物作鬥爭。列寧在“偉大的創舉”那篇文章中特別討論了這個問題。在那篇文章裏說：“當新事物剛

誕生出來的時候，舊事物在相當時期內總是比新事物強有力些，這無論在自然界或社會生活中都是常見的現象。譏笑新事物幼芽的軟弱，表示輕浮知識份子的懷疑態度等等，——這實際上都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手段，都是保護資本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我們應當仔細地來研究新事物的幼芽，極仔細地對它們，盡力幫助它們成長，並‘慇懃照顧’這些柔弱的幼芽”。（“列寧全集”第29卷第392頁，中譯本“列寧文選”第二卷第596頁）

布爾什維克黨，列寧和斯大林都指示，支持科學中和社會生活中的新的、生長着的東西是如何需要。黨中央委員會對於米邱林生物學反對魏斯曼主義思想的鬥爭所表示的支持就是這種幫助新東西的榜樣。

因此，不能不指出在B.M.凱德洛夫的“在科學發展中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意義”一篇論文中一個不正確的論點（“蘇聯科學院通報”1948年第2期）。在這篇論文中，凱德洛夫教授於一些正確的思想外，却提出了以下的議論：“這裏我們發現科學中站在舊的方面反駁批評新的也有一種積極的作用，如果在新東西的發展道路上，沒有這種反對的批評，那末，對於新的再發展就不會有充分的刺激。……因此站在舊的立場上批評新的，如果打擊了它致命的地方，也可以促進新的發展。”

因此，凱德洛夫教授以為任何批評和自我批評，無論從什麼立場來的，為什麼目的進行的，都是好的。對於這一點我們是不能同意的。必須經常以下述斯大林同志的指示為領導：“我們需要的不是任何的自我批評。我們需要能提高工人階級的文化程度，發展工人階級鬥爭精神，鞏固工人階級勝利信念，增加工人階級力量，幫助工人階級成為國家的真正主人翁那樣的自我批評。”（“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32頁）

就以上所指示的觀點看，凱德洛夫教授企圖超越地站在新的和舊的、進步的和落後的鬥爭以上，那是很大的錯誤。因為凱德洛夫教授以為舊事物對新事物進行批評，對新事物有益，其實他是在保衛舊的，並叫人對新事物予以致命的打擊。這樣的立場是有害的，應當堅決地予以反駁。

不只對於科學的理論和觀點應當有批評的態度，對於科學上一切實驗的、經驗的材料，也應當

採取同樣的態度。科學史上曾經有過一些錯誤的觀點，是引據實驗而來的。所以必須特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實踐是真理的標準和這標準的辯證性的指示。

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的天才著作中，列寧以下列方式規定實踐在認識論中的意義：“生活、實踐的觀點，應該是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它必然地要到達唯物論，而把大學教授的煩瑣哲學的無限妄想拋在一邊。”（“列寧全集”第14卷第130頁。中譯本“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第138頁。）實踐、經驗、觀察給科學預備材料，使其能深入現象的內部，確定其規律性；同時在實踐中，尋找出科學的有力幫助，證明已發現的規律的正確性。但是不要忘了實踐標準的辯證性，這一點在我們通俗哲學文獻中不是都找得出反映來的。

列寧發揮他的關於實踐標準的理論，寫道：“當然，在這裏不可以忘記：實踐標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確證或駁倒人的任何表象。這個標準同樣是這樣地‘不確定’，以便不致使人的知識變成‘絕對’，可是同時它又是這樣地確定，以便和一切各種各樣的唯心論與不可知論進行無情的鬥爭”。（“列寧全集”第14卷第130頁。中譯本“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第138頁。）不研究列寧的這個指示，就不可能正確估計經驗、實踐的材料。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始者提供了許多如何運用實踐標準的榜樣。列寧教導說分析現象不能僅局限於它的個別表徵，應當全面地，在其聯系與關連的全體上去觀察它。列寧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的分析，可以作這種研究態度的榜樣。列寧要求的是：在確定戰爭的階級性時，要全面地分析一切交戰國裏統治階級所處的客觀地位：“為要說明這種客觀地位，我們就不應該引用單個例子和單個材料（在社會生活現象極端複雜的情形下，隨時都可以找得出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單個事實來證實任何一種意見的），而是一定要引用所有關於一切交戰國和全世界經濟生活基礎的材料的總和。”（“列寧全集”第22卷第178頁，中譯本“列寧文選”第一卷第921頁）

這個關於研究複雜社會現象的方法的列寧指示，對於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有很重大的意義。它揭露各個知識部門中所犯的許多錯誤的根源。

抽取事實整體中的某些個別材料來證明這種

或那種觀點，這在自然科學史中也是常常發生的。在奧爾別里院士對於動物有機體交感神經系和大腦皮質作用的觀點中，就表現出這種片面的態度。奧爾別里院士以某種干擾加於交感神經系和其高級部分(小腦)的活動，證明因此在有機體活動中引起一般的紊亂現象，特別的是在它與大腦皮質相聯系的高級神經活動中。由於這樣，奧爾別里院士就作出結論說：交感神經系及其高級中樞在有機體的一切生命活動中掌執着指導性的功能。這樣的結論似乎是有事實的根據，但是實際上，這只是一部分的事實。

在這一點上，奧爾別里院士離開了巴甫洛夫立場。他忽略了巴甫洛夫的關於有機體與環境相互作用和關於在動物生命活動中腦高級部分的指導作用的普通生物學學說。巴甫洛夫是以動物界進化發展的材料為其出發點的，這些材料證明：在進化的過程中，保證有機體與環境間複雜的相互關係的反射中樞，愈來愈多地轉移到神經系統的頭部末端，在高等動物則集中於大腦皮質。在神經系統不同部分的複雜的相互作用中，指導作用應該是歸於保證有機體整個地適應周圍環境的神經系統的高級組成的。因此，為了正確地了解交感神經的工作，許多巴甫洛夫學者建議奧爾別里院士，應當不僅祇研究交感神經系統的紊亂對高級神經活動的影響，而且首先要研究高級神經活動、腦的領導部份對交感神經系統的特性和機能的影響，換言之，應該全面地研究問題。忽視這種情事，使得奧爾別里院士在科學工作中發生了錯誤。

不以批評的態度對待實驗的材料，在發現科學新事物的道路上會是一種障礙。門德列也夫如果盲目地信任一切他所知道的元素的原子量，他便不可能發現化學元素的週期律。他全面地分析元素的化學的和物理的性質，建立了週期的規律性，因而大胆地修正了當時科學中所共認的幾種元素的原子量的值。門德列也夫所提出的理論的原子量由以後的實驗完全證明了。

對於積累的經驗，採取保守的態度，是科學中各式各樣的有限度論者（把落後的生產數量與指數當作生產發展可能性的限度，因而按落後的生產數量與指數確定其生產計劃的人——譯者）的特色，他們把舊的實踐變成教條，變成絕對的，因而看不見新的現象和事物，不能幫助實踐本身的

發展。

社會的實踐是永遠受歷史條件所限制的。它是經常發展的，但是在每個一定期間於一定程度之下是受限制的，所以要求對它採取批評態度。在實踐中有進步的東西，也有落後的東西。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人類不只利用經驗發現並證明自然界的規律性，而且也以這規律變革實踐本身，加強實踐本身的力量，以擴大其在自然界的過程上所起作用的界限。同時不可避免地舊觀念會破滅，而舊經驗現出了它的局限性，而科學中和生活中新的與進步的東西發展並鞏固起來。

資產階級的制度和資產階級的思想，按其本質說，在各方面都是真正科學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障礙。資產階級社會是建立於剝削制度上，和人對人攻擊的野蠻原則上。自然，在這種社會中每個人都是怕在許多競爭者和敵人面前暴露他的弱點的。被競爭、階層限制、階級對立、民族仇恨，宗教偏見所分化的人們，當然盡力隱蔽自己可以受致命打擊的地方。那裏是沒有自我批評的。

帝國主義的反動思想盡力遮蓋資本主義的潰瘍，隱藏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性和資產階級文化的腐朽性。

資產階級思想對於科學的創造性是有致命的影響的。如果在資產階級科學中也還有意見爭論，也還有一些學者對另一些學者的批判，那麼，資產階級學者總是不知道自我批評的。科學史證明，對於自己的著作沒有批評的態度，嚴重地影響到許多科學家的命運，影響到科學理論的命運。作為例子，可以引證十九世紀初的瑞典大化學家柏拆留斯，分子結構的電化學說的創始者。按照這個學說，化學的化合物只是由帶有正負電荷的原子互相吸引而組成。柏拆留斯的學說在一定階段上是有進步性的。但是科學很快地被新的事實豐富起來，因而證明這瑞典學者的學說有限制性與這學說有它不正確地方。但是柏拆留斯不能看見，不願看見科學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把這個學說拋到後面去了，它需要根本的變革。

歸根結蒂，資產階級學者對待他所創立的學說，像對待“神聖不可侵犯”的私產一樣。他不把新的觀點看作科學發展的承繼的更高階段，而把它看作競爭的出現，要用盡所有方法向它攻擊。柏拆留斯被這種思想俘虜了，否認顯明的事實，譏笑當

時化學中新的進步的事物之發現者。因此他在科學中起了保守作用，反動作用。

德國細菌學家郭霍的一生及其發明是另一個顯明的例子。郭霍是科學的微生物學創始人之一。他發現結核菌，奠定了與這種病菌作鬥爭的基礎。但是科學上的成就對於郭霍發生了一種相反的作用。他不能掌握科學的自我批評，他有極端的自負心，對於不合乎他自己意見的新觀點採取仇視態度。郭霍對於俄國學者梅契尼科夫的態度就是如此。梅契尼科夫發現人類血液中的一種特別運動着的細胞——白血球——能消滅落於有機體上的病菌。白血球——梅契尼科夫稱為噬細胞——對於病原微生物作鬥爭，在有機體自衛活動中起重要作用。

梅契尼科夫在他的備忘錄中說：“郭霍雖然是當時整個青年細菌學派的領導者，他却同時反對我的傳染病免疫性的學說。他暗示給他的學生進行一些反對我的意見的研究”郭霍對於梅契尼科夫給他的證明新理論之正確性的顯微鏡標本片，都不願研究。一直到十九年以後郭霍才承認梅契尼科夫是正確的。

這樣無限度的自負心和缺乏自我批評的精神使郭霍在科學上造成了慘劇。1890年，他曾聲明已發明一種可以治療結核病的藥品，稱為結核菌素。這種聲明曾引起很大的興奮。沒有人懷疑這種發明，因為都信任郭霍的“德國的精確性”。但是由於判明了結核菌素在治療上不發生作用，人們很快就失望了。雖然如此，郭霍仍不承認他的製造品完全失敗，反把責任推在醫生身上，彷彿醫生不會使用這種結核菌素。

這樣對於自己的研究結果缺乏自我批評的態度，使許多學者在科學中離開了革新者的陣營而轉入保守者的陣營。

由於在資產階級科學史上，剛才所說的那種事實非常之多，便不得不去尋求某種對於這種現象的普遍解釋。資產階級科學中流傳着一種觀點，認為這是因為一種人類永恒的生理學規律，根據這個規律，學者在青年時代是一個革新者，而到了老年時代便不可避免地成為保守者。

事實上使革新者必然轉變為保守者的任何永恒的生理學規律，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在每一時代中，人類個性的發展是受那時代社會發展規律

所制約的。資產階級社會建立在私有財產制度上，歸根結蒂，這就規定了資本主義世界中科學工作者的宇宙觀。資產階級思想不容許自我批評，把學者的思想機器套上了鎖鍊，使他變成自己科學發明的奴隸。

在資產階級科學中，有一種特殊的“批評”需要提及。這種“批評”旨在破壞科學，傳播對於科學力量的不信任。在這種懷疑派的哲學家中間，康德是最成功的。他盡其全力想證明人類智慧不能認識自然界的實際現象和規律性。這種最卑視、最醜化、最污蔑人類智慧的哲學的後繼者，在資產階級自然科學者中可能找出很多數目。有一個德國生理學者杜波——瑞孟曾提出可恥的格言，說：“我們永遠不會認識的”。病理解剖學家微耳和重複他的話，大叫“限制自己”。外國的現代物理學者還盡量地保衛原子過程原則上的不可認識性。對於這些人們季米里亞席夫很憤慨地說：“這樣神志昏迷的無知充滿他們的胸中，他們樂意重複這話。我不了解。我將來也不了解，我永遠也不了解。”巴甫洛夫院士在對於資產階級心理學者的講演中曾提及他們說：“足見他們是有一種希望，就是希望現象不能證明。這是多奇怪的事！”否認世界的可知性表現了資產階級科學的腐朽，破產和頹廢。

* * *

廣泛地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是真正先進的科學的一個特點。正如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部孕育了新社會制度的前提條件一樣，在資產階級學者中分化出一些人來，這些人能打破圍繞他們的環境中的傳統和規範，產生了新的科學方法。這些學者開始是自發的，但以後就是自覺地站在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俄國的自然科學史就是被這些學者豐富起來，擺脫了西歐科學中許多的學院傳統，最初在革命民主派的進步觀點影響下發展起來，現在則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基礎上發展着。

在上一世紀的中期，有機化學中的革命轉變是偉大的俄國人波特列洛夫所完成的。當時科學中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有機物質的分子是什麼？是由引力維繫的一團無秩序的原子呢？還是每個原子具有一定作用的、有秩序的結構呢？波特列洛夫以嚴格的科學方法證明，只有第二個解決的可能。他並且強調在化學變化過程中，我們可能知道分子的真實內部結構。這種可能性為當時所有站

在獨特的化學的不可知論立場上的大化學家所反對。波特列洛夫站在唯物主義的立場，責備科學中否認原子和分子真正存在的唯心論者。他嘲笑當時著名法國化學家別爾提路的輕視科學中理論之意義，而稱他為爬行的經驗主義。他又揭發停留在陳腐學說的落後觀點上的俄國化學家門淑特金。波特列洛夫是站在新的立場與舊的作鬥爭。但是他不以他的學說是創造者的王冠，不把它當作科學中最後的結論。

波特列洛夫要求對於他自己創造的學說也採取批評的態度。他說：“不能不注意到化學結構學說所得出的結論，在成千的情況下都合乎事實。當然，如同任何學說一樣，這裏自然也是有不夠的，不完全的地方，常常發現些事實不是嚴格地合乎化學結構概念的。當然，應該特別希望這樣的事實增多，不能用現有學說解釋明白的事實對於科學是最可寶貴的，從這裏科學家有優先權希望在最近的將來獲得發展。”波特列洛夫一生都在繼續發展和改善他的學說。在波特列洛夫學說的基礎上有機化學得到洶湧的發展，有機合成的強大工業建立了，數上百萬的新物質湧現出來，複雜化合物的結構被尋找出來。

另有一位在科學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中作表率的是俄羅斯自然科學大師，就是巴甫洛夫院士。在高級神經活動的領域中，他的發明史是一個很深刻的教訓。

巴甫洛夫在研究消化腺的作用時對下列情況感到驚奇：以食物喂家犬，不只當食物落在犬口中時，犬分泌唾液，即便在一定距離中，食物的形態，氣味及其他間接的表徵也引起同樣作用。當時盛行的心理解釋是一種不明確的假說，以為犬在“希望”、“記憶”等。巴甫洛夫堅決地反對這類推斷，以為是不科學的。對於這複雜的心理現象，他勇敢的尋求客觀嚴格唯物主義的解釋方法。

巴甫洛夫在對這一事實的研究上，却與他試驗室中同事斯那斯基博士走了很分歧的道路。巴甫洛夫說：“斯那斯基停留在主觀地解釋現象上，而我對這種對待問題的態度的荒唐與科學上的勞而無功感到甚為驚異，並開始尋求另外的從困境中解脫的道路。經過堅持的研究，花費了極大的心機，最後，我決定，在這所謂心理的激發面前，我仍然要保持一個純粹的生理學家的身份，換言之，即

一個客觀的外在的觀察者和實驗者的身份，只研究外在的諸現象及其間的關係。”（“巴甫洛夫著作全集”第37頁）巴甫洛夫站在新的研究道路上，在解決這自然科學中最複雜而且最重要的問題中，得到了特殊的成就，發現了大腦半球的作用的基本規律。

巴甫洛夫畢其一生激烈地與於大腦作用的腐朽的、唯心主義的觀念作鬥爭。他揭露並打破站在唯心主義立場的資產階級心理學者和生理學者——喬萊、謝靈頓、溫德等人——的反動觀點。巴甫洛夫為了證實新學說而鬥爭，百折不撓地向前邁進。他說：“學術家的情況是常常有些奇怪的：在一方面，當你達到目的時，當你了解時，你是滿意的。自然這樣是好的。對於你的活動，這是一種推動力。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你停留在這一點上，那末，你就局限於有數的知識上。你得到新的確切事實，那是快樂的，但是在另一方面應當告訴自己：在這一點上事業並不終了，應當再向前走，並提出自己需要解決的新問題。”（“巴甫洛夫學界”第3卷192頁）

巴甫洛夫的“關於大腦半球功用的講義”一文，就是科學的創造性的一個卓越的榜樣。那裏他闡明了這個最複雜的器官的活動的基本規律。巴甫洛夫方法與教條主義不同，它的顯著特點是在這個著作中巴甫洛夫特別地說明他和他的同事在工作過程中所犯的錯誤，並且用全章的地位陳述腦生理學中尚未解決的問題。有些人以教條的態度解說研究的對象，在聽眾和讀者面前有意地隱藏真正的科學創造的困難與道路，掩蔽工作發展的前途。巴甫洛夫的態度與這種態度是有天淵之別的。他在“講義”中曾說：“一般地說，這個生理學的新部門確是很有研究趣味的，它同時滿足人類智慧中兩個永遠併行的意向：努力求新的更新的真理，反對任何最後知識的自負。”（“巴甫洛夫全集”第四卷第325頁）

去年夏季所舉行的蘇聯科學院與蘇聯醫藥科學院聯合的大會，是巴甫洛夫學說的勝利和科學中自由討論方法的勝利。大會也是斯大林式的關心巴甫洛夫學說命運的表現。參加的人們以批評方式和自由討論態度研究生理學戰線上的現狀。K.M.貝柯夫和A.Γ.伊凡諾夫——斯莫林斯基的報告批評了許多生理學者的不正確的和反巴甫

洛夫的觀點，並指出了創造性地發展我國的偉大的巴甫洛夫思想的道路。伊凡諾夫——斯莫林斯基教授在結束語中分析他自己著作中的錯誤，作為自我批評的表率。他說：“回顧一下三十多年來我所走的科學道路，我看見我的工作中的許多缺點，其中大部份已經得到克服和糾正，但是有許多缺點還正在克服和糾正中。很可能的，與任何學者一樣，還存在着那些我注意不到的錯誤。以同志的態度提醒我注意這些，我是感謝的。”

應該注意在生理學中某些地方所採用的一種衛護不正確觀點，抗拒批評的方法。因為相類似的辯解在其他的一些知識部門中也被利用來衛護不正確觀點，抗拒批評，所以這一點更其重要。

斯大林同志曾揭破了馬爾與其“門徒們”以馬克思主義名義在語言學中提出語言的“新學說”的企圖。馬爾披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企圖迷惑他們的反對者對於“新學說”的批評。斯大林同志的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證明了馬爾及其“門徒們”聲稱他們的語言“新學說”是馬克思主義學說是全無根據的。同時斯大林同志的著作為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樹立了堅固的基礎。

至於在其他科學部門中，也有以辯證唯物主義掩飾其錯誤觀點，並責斥反對這觀點的乃是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情形。例如形式遺傳學者以為他們承認遺傳性的物質的體現者，根據這個理由說他們的學說是一貫地辯證唯物主義的學說。在自然地理學中，被現在科學輿論所駁斥的A. 格里各耶夫院士的煩瑣的公式，在很久的時間也是自稱為是辯證的。在生理學中可以看見同樣的情形。在感官生理學中，奧爾別里院士曾想挽救格爾莫古列茨——謬萊爾的主觀唯心觀點並破壞巴甫洛夫的關於分析器的客觀學說。他的根據只是：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提到感官生理學是認識論的一個部份。同時奧爾別里卻沒有想到列寧在“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中對感官生理學中的唯心觀點的批判。И. С. 柏里托夫院士以迷糊不清的關於由量到質的轉變的討論和關於辯證法的引證，來說明巴甫洛夫關於高級神經活動學說對於人類的不妥性。在精神病學中各種諸如“腦的病理學”之類的反科學觀念的同情者，以辯證唯物主義的名詞裝飾他們的觀念，並大喊說由於巴甫洛夫的學說，精神病學正遭受着“很大的機械主義危機”的威

脅。當時列寧曾揭破俄國的馬赫主義者，嘲笑他們對於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不加批評態度，曾說“熟讀馬赫，信任馬赫，轉述馬赫，把這個稱為馬克思主義！”不幸的，許多無經驗的人們作出類似的錯誤：熟讀馬爾，信任馬爾，轉述馬爾，把這個稱為馬克思主義！熟讀柏里托夫，信任柏里托夫，把這也稱為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我們祖國獲得了無上權威。所以必須揭破並杜絕利用這權威為科學中錯誤觀點作掩護和根據的企圖。

辯證唯物主義，正如恩格斯所指示的，就是對自然界的本來面目的了解。因此，每一個科學理論必需首先符合現實實際，從實踐中來檢查。並且，不能忘記，唯物主義本身也隨着每一個劃時代的自然科學發現而日益豐富起來。

生理學問題的討論表明在科學研究機構中仍存在着一种不合乎蘇維埃科學的習性，信任科學的領導者，以為他們無錯誤，壓制對於他們的尖銳批評。許多生理學者心裏不同意這個或那個同志的錯誤科學觀點，但是因為不能正確地體會對於同志的責任，所以不給予批評。對於同志的正確的責任不是彌縫他的科學上的錯誤觀點與失敗，而是及時予以揭發。

曾經有幾個“受了委屈的人”責備列寧，似乎列寧以非同志的態度對待他們，因為列寧揭露了他們的錯誤。關於這一點，列寧寫道：“我們所認識的對於同志的責任，是幫助一切同志的責任，容納同志們意見的責任，但是在我們看來，對於同志的責任是由對於俄國的和對於國際的社會民主黨的責任中所產生出來的，而不是反轉過來。”（“列寧全集”第四卷244—245頁）在科學中，真正的同志關係主要地是從關心科學發展，關心我們祖國繁榮產生出來的。適時地批評錯誤是同志的責任，是愛護犯錯誤的人使他很快地得到糾正。

批評和自我批評在生物學革命者——米邱林——的著作中有顯著的表現。米邱林負起改善菓樹品種使適宜於在俄國中部種植的光榮任務後，開始時採用當時一般公認的風土馴化方法，把運來的南方品種接枝在本地的台木上。關於他的初期實驗，米邱林曾寫道：“當時我也是傾心於克列爾的風土馴化方法的。這個方法使許多人花費了很大的代價，連我也在內。大量的工作，金錢和時

間幾乎無效地花費了。在克列爾學說領導下，我也曾在唐波夫省像奇蹟一樣地馴化了許多外國優良品種的梨，它們在好幾年之中，生長得很好，結實也順利。於是我自己信任類似這樣奇蹟是可能的，並且寫了一篇關於馴化經驗的文章以說服他人。……但是，好像故意作對似的，次年的冬天一半以上的品種都凍壞了。以後再一年，除了很少品種外也凍壞了。剩下的只有三種。就這樣我自己安慰自己，以為無論如何，工作不是完全白費了。剩下的品種，如果沒有我的照顧，是不是自己也會堅韌耐勞。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又從外國苗圃購買了那些品種，結果證明了，我的推測是真實的。”（“米邱林全集”1948版第一冊137頁）

米邱林發現了以前培養新種方法的錯誤。那種方法是把順利條件的希望作基礎的。他終於開闢了有意識地支配植物形態的道路。米邱林使用營養接種，遠緣雜交，定向植物培養的方法，選擇出來優秀的植物新品種：如蘋果、梨、櫻桃、鵝形莓、黑莓、無子葡萄、阿夫莓、杏、棗、玫瑰以及其他有用的植物等。米邱林學說成為支配生物自然界發展過程的新的最高級階段。

米邱林及其後繼者會不得不與具有反動思想的生物學者，與米邱林尚稱之為“偏見的腐敗病菌”，進行殘酷的鬥爭。形式遺傳學者以為存在着不受外界環境影響的“不死的遺傳體”，米邱林以實驗的方法證明這種學說的錯誤。米邱林在反對這種“園藝官僚派假大師”的鬥爭中，未嘗一刻停止發展並改善他的工作方法，新學說。他曾對他的後繼人說：“但是，這裏我需要警告你們：執行我的方法時要經常地向前看。因為簡單地應用它們就可能把它們變成教條。把你們——米邱林工作者——變成簡單的抄錄者和編輯者。這與米邱林工作方法是完全相背馳的，因為，我的基本工作方法便在於不斷努力向前，在於嚴格檢查和改進實驗，在於觀察一切新生的東西，在於運動和變化。”（“米邱林全集”1948年版第四卷246頁）

在蘇聯列寧農業科學院有歷史性的八月大會上，最後粉碎了我國魏斯曼、摩爾根主義的贊助者並慶祝米邱林生物學原則的完全勝利。大會又粉碎了想折衷地把進步的米邱林學說與形式遺傳學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的觀點結合在一塊的“中間路線”企圖。生物學的鬥爭以新的力量證明斯大林

同志的指示：“在原則性的問題上，沒有並不可能有‘中間’路線。”（“斯大林全集”第九卷4頁）大會為戰鬥的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在科學中作了榜樣。它幫助了許多科學工作者擺脫了他們的錯誤，在進步的米邱林生物學的道路上站起來。

米邱林生物學的勝利揭開了科學研究中新的空前的遠景，指向我國人民威力和福利的新的增長。

李森科院士為米邱林生物學的發展進行鬥爭時對進步的生物學的寶庫有顯著的貢獻。他創始了植物有機體的階段發育理論，並根據這個學說發展了改造植物自然界的寬廣道路。這個學說的實踐結果是無窮無盡的。但是李森科院士號召蘇維埃學者不要停留在已得的成就上。他指明說：“農業科學中大部分的學理是這樣的：不只不應長期停留在那裏，而且研究者本人需要‘破壞’它，雖然這學理是他自己提出的。這樣的學理可能是相對地正確和真實，因此是有用的。但是仍然必須尋找更為真實更為正確的東西來代替它。這裏却有一種學理需要認識需要永遠記着，作為工作的出發點，不要離開，不要懷疑，不要以為它會忽然不可靠起來。這種學理就是發展學說的基本觀念，辯證唯物主義的原則。”（“農業生物學”農業經濟出版社1948年版195頁）

李森科的一篇關於威廉士的農業學說的文章是一個例子，說明了如何需要以批評的態度反覆研究科學中各個錯誤觀點，如何需要對以教條主義態度對待如威廉士似的著名學者的意見和言論作鬥爭。

勒柏辛斯卡婭的活動是科學中反對教條主義的一個顯著的例子。她是經常熱烈地反對生物學和醫藥學中微耳和學說的根深蒂固的教條。微耳和主張生物有機體中任何細胞只是從細胞中產生出來，細胞以外無生機。勒柏辛斯卡婭出來反駁微耳和觀點時遇見了一批具有保守心理的學者。這些人不但拒絕懷疑微耳和學說，並且拒絕研究勒柏辛斯卡婭的試驗材料與論點。至少他們企圖證明她的工作是站不住的。大概當他們感覺他們反對勒柏辛斯卡婭的論點不中肯的時候，這些微耳和學說的贊助者決定鬥爭“不在於本領而在於數目”。因此在“醫學工作者”雜誌中刊載了十三人簽署的一篇反對勒柏辛斯卡婭的文章。很顯明的，他

這樣的“集中火力”的方法想壓倒他們的科學反對者並強迫使其緘默。但是他們計算錯了。科學問題不是用簡單的多數投票所能解決的，論文署名的人數不能增加他們科學辯論的力量。勝利屬於科學中新的進步的方面，勒柏辛斯卡婭的方面。喜歡用“集中火力”的人們失敗了。

在公開的意見爭論中，勒柏辛斯卡婭以自由討論的方式與微耳和的細胞病理學的腐朽了的觀點，進行鬥爭到底。她在這個鬥爭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支持，即是在1943年大戰最激烈時，學術家最好的朋友，前進的唯物主義的科學大師斯大林同志所給予的支持。

蘇維埃自然科學家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在科學工作中日見廣泛地施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

自由討論和爭辯成為蘇維埃科學武庫中常備的武器。以自我批評的態度對待自己的研究、學理的觀點、試驗的材料，日見增加地成為科學工作者的創造性得到發展的最主要的內在刺激。由於能不怠不倦地掌握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幹部同志提高了理論水平與真實地自由批評的發展，其結果，就是在我們祖國揭破了形式遺傳學的反科學的理論，化學中對於共振學說不合事實的觀念，錯誤的微耳和觀點，生理學與醫藥學中機械主義的唯心主義的曲解。現在在出版界開始了關於天文學、地理學、地質學（礦石形成，沉積層地質等重要問題）基本問題的討論；關於理論物理學、微生物學、技術、礦山業、地球物理學各種個別問題，正熱烈地交換着意見。

在科學雜誌中日益加多地公佈批評的文章並刊載討論的材料。“巴甫洛夫高級神經活動雜誌”中刊出了一系列尖銳的有充實內容的著作，以揭破奧爾別里、魯染斯基、阿農欣及其他幾個生理學者的錯誤觀點。在“石油經濟”雜誌中披露了關於石油來源問題的有趣味的討論。但是，在科學界某些地方仍然隱藏着過去的殘餘，對於工作方法不正確的觀念，和反對自我批評與輕視批評作用的態度。必須記着，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從舊社會承繼下來的舊習慣作風、傳統和偏見是社會主義最危險的敵人。”（“斯大林全集”第6卷248頁）

在我們這裏，現在很難找出公開地反對科學中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人。但是開展批評和自我

批評的障礙仍不在少數。必須注意那些同志的論辯，他們在原則上是贊成批評的，但在具體場合，如果這批評是關於在科學研究機關中居於領導地位的人，則反對批評。一般地說，這些奇怪的同志以為批評會損害被批評者的權威，妨碍他執行他的責任和職務。顯然，這些同志以為遮飾學者的錯誤，以為焚香崇拜比批評更可促進科學的發展。事實上沒有比這觀點再錯誤不過的。

對待批評的正確態度可以鞏固科學領導者的權威，使他的工作更有成就。如果公正的批評被反駁了，被鎮壓下去了，那末，過了一定期間，即在由於鎮壓批評的緣故而造成的安靜以後，權威就不可避免地破產，因為科學的前進是不可能被阻止的。

在實踐上，有時自我批評流於形式。形式主義的自我批評，半承認半不承認，或非出所願地改變意見而又不說明不分析錯誤根源，這些都不能使學者解脫錯誤的重負，也不能使他們正確地站在新的道路上。蘇聯科學院主席團檢討1948年蘇聯列寧農業科學院八月會議的總結時，奧爾別里所作的自我批評就是這種形式主義的自我批評的例子。當時奧爾別里院士聲明說：“可能是我發言不夠熱烈，如果我把十年來科學院生物學部門中所發生的一切罪過坦當下來，而不企圖採取任何步驟把責任歸諸他人的話，那末我覺得似乎很難有更大的自我批評。這是我了解的自我批評，我想蘇維埃所認識的自我批評，不能與這有不同處”。（“蘇聯科學院通報”1948年第9號）

實際上蘇維埃所認識的自我批評，與奧爾別里院士講演中所說的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的是：承認錯誤是不夠的，必須揭出錯誤的根源，並且最主要的是自己加入反對錯誤鬥爭的戰線。奧爾別里院士對於他的形式遺傳學和他的反巴甫洛夫的錯誤，並沒有進行這樣的工作。因此，科學界認為他直到現在所作的聲明，僅是形式上承認錯誤，這不是偶然的。

在科學界中，還有一種反對批評的論辯，這是由於未能克服崇拜外國的心理所產生出來的。當反對孟德爾、摩爾根主義的尖銳鬥爭正在開展的時期，就有個別人提出危險的警告說：這樣的鬥爭是不是會損害蘇維埃科學在外國的威信？在批評化學中自外國輸入的唯心主義的共振學說時，也

有幾個化學家提出問題說：這樣批評是不是使蘇維埃化學的權威有損失？顯然，這樣性質的“辯論”是不能認為站得住的。進步的蘇維埃學者在他們的工作中是受斯大林同志在偉大的十月革命前夕所說的話指導的：“必須丟棄以為只有歐洲能給我們指示道路的腐舊觀念。（“斯大林全集”第3卷187頁）蘇維埃祖國為前進的科學而鬥爭，是樂意採取外國真正進步的學說的，這樣的鬥爭使蘇維埃科學的威信得到鞏固，獲得科學上的領導地位。至於有反動思想的外國學者，對於他們的意見，恐怕不必去特別關心了。”

不同形式的壓制批評使科學受到嚴重的損害。這裏必須指出的，有些個別部分的小團體企圖在科學中造成壟斷局面，形成如斯大林同志所稱的軍閥統治。有時科學機關、雜誌、委員會等的領導地位，落在一種在科學中運用命令主義的小團體手內。這些人把小團體的利益放在一般科學利益之上，“自己的”紀律超越國家的紀律，阻止科學中批評的發展，妨碍青年科學家的前進。

這些軍閥方法的實行者，常常在整月整年地拖延科學批評著作的發表，阻碍他們的反對者在科學上的發展，操縱學術機關中的工具、材料和設備，以妨害反對者的科學工作。有時到了極端，驅逐批評者於科學研究機關之外。

不久以前在蘇聯科學院地理學研究所曾發生迫害批評者的情事。

在季米里亞席夫農業經濟學院蒲興斯基院士的試驗室中，發生過一個事件，科學界因此很受震動。蒲興斯基院士的助教K.巴爾丹按照指定的題目研究草薺地的根本改造，得到與領導者的觀點相反的結論。蒲興斯基院士不傾聽他的批評，反禁止他的講座，甚至於撤去他的職務。

科學團體中的窒息空氣，使學者的錯誤不能及時發現，也不能及時改正，因而又造成新的錯誤。蘇聯科學院物理技術研究所工作者拉提捨夫，根據未曾精密研究的試驗發表一個結論，即以爲鐳C的原子核光譜中存在着特殊的精細結構。這個工作在研究所中未曾批評討論，就認為是無可爭辯的，選列爲科學的成就，並且得到獎金。但是經過其他機關的檢查，證明其錯誤，即便拉提捨夫本人也不能不承認。不必說，科學工作中可能有不同的試驗的和理論的錯誤。但是能以自由的與端

正的態度討論工作的科學團體，這種錯誤的可能性就減少很多。物理技術研究所不是這樣，那裏科學工作者的工作是並不受集體檢討與批評的。

最近因爲在科學中阻止布爾什維克批評的發展日見困難，有些尚未變成軍閥者的人們改用一種“中和”批評的方法。有些個別的雜誌編輯部接到了批評的文章後，就送給被批評者表示意見。在文字“潤色”，滑平稜角並和緩格式以後，與被批評者的答覆同時刊出。在“實驗物理與理論物理雜誌”（第21卷第9期）中，C·維爾諾夫，H·杜布魯丁，和T·查采平的一篇“關於變子存在的問題”的論文，批評A·亞力漢惹恩與A·亞力漢諾夫關於宇宙綫的工作，就是雜在三個被批評者的著作中同時發表的。無疑義的，這樣做的目的是中和批評的作用。

有幾個科學雜誌的編輯委員會以“秘密批評”的方法代替自由交換意見和公開討論。此種方法是這樣進行的：接到了帶尖銳批評性的與提出新的原始問題的論文時，就送交無窮無盡的“秘密評議”。照例評議的反駁意見又送交原著者建議修正，修正後的論文又送交評議，這樣循環交送。事實上編輯部變成一個轉運站，不是負責決定的組織，只是轉送論文和收集評議意見而已。切林拆夫教授的關於批評化學中唯心主義共振學說的論文，就是這樣停留在編輯部的公文袋裏有幾個月的時間。勒柏辛斯卡婭教授的著作也被編輯部“研究”了幾個月。

不幸的，有些地方還存在着一种腐朽的想法：以爲不刊載尖銳的新穎的材料是安全的，以免因發表它而帶來各種妨害和意外。但是科學的前進運動最後要揭破並清除隱藏在科學機關編輯部的那些胆小如鼠、自私自利的東西。

所有這一切妨害蘇維埃科學自由發展的病態現象，都不應在我們科學機關中存在。對於不同形式的，想實行軍閥方法，在科學中佔壟斷地位的小團體，都應該予以揭破並根除。對於這些按“不惹事生非”原則而生活，阿諛“有資格者”，懼怕科學中每一個新原理的那些廢物，蘇維埃科學界是不能容忍的，必須予以摒棄與斥責。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關於思想問題的決議，鼓勵了所有的科學團體。在聯共（布）中央的指示和領導下所進行的科學討論，證明了自由批評方

法在科學發展中的重要意義。關於哲學、生物學、生理學、生命物質發展等的討論，都是科學史中重要的標幟。斯大林同志親自參加了的關於語言學的討論是語言學發展中的一個轉捩點。同時斯大林同志的論文，對於科學發生巨大影響，使批評的方法與自由的思想爭論，在各種認識部門中得到深入。

現在對於組織科學的自由討論，已經獲得了許多經驗。首先要強調的是廣大範圍的全聯邦討論，類似以前關於語言學、生物學、生理學的討論。全聯邦討論或者採取公開集會的方式，或者在刊物上進行。這些討論解決某些科學部門的根本問題。執行和肯定這門科學中的先進的、進步的方向。而關於天體演化學和化學構造理論的討論的任務則稍有不同；這些討論以批判地分析這門科學的狀況，並說明進一步研究所討論的题目的道路為目的。在各研究所以及試驗室的學術會議中，正廣泛地討論各樣爭執的問題。組織了許多專門討論會，如同蘇聯科學院在組織沉積層地質討論會時所作的一樣。現在，在那些越來越經常發表討論材料的科學雜誌的活動中，可以看到一種活躍的氣象。蘇聯科學院主席團直屬的巴甫洛夫科學會議已經完全表明了自己在生理學中的作用，它在批判地研究生理學和醫藥學部門中各個科學機構的活動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有效的工作。

我們的任務在於把自由批評與思想爭論方法

變成所有科學團體的，從學院以至試驗室與講座的工作基礎。必須廣泛地吸收年青的、正在成長着的科學幹部，參加科學討論，以培養他們在科學中勇敢的大膽的創造精神。批評和自我批評保障科學團體的健全狀態，從而推動科學工作前進。

蘇維埃科學的成就是偉大的。這些成就是由於黨和蘇維埃政權對於我國前進科學的全面發展之不倦的關心照顧而獲得的。為人民、為社會主義祖國的繁榮，我們絕大多數的學者是樂意貢獻自己所有的力量與知識的。學者們感覺他們對國家的重大責任，他們盡全力幫助蘇維埃國家解決共產主義社會建設中的實際問題。由於這一切，所以蘇維埃學者在許多學識部門中佔世界科學的第一位。

為斯大林式的關心所撫愛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工作者，在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事業中，將獲得人類智慧的新的進展和新的勝利。這將幫助進一步貫徹地和堅持地鞏固科學工作中的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方法。

〔譯自蘇聯“布爾什維克”雜誌1951年第21期〕

校者按：本文原為何思源先生所譯，發表於1月26日光明日報。發表前曾由校者校正其中一部份科學名詞等。現在將全文再加以校正，重新發表。由於校改的地方較多，又未能和原譯者商量，因此，譯文中如有錯誤，完全由校者負責，敬希讀者指出，以便改正。

“有機化學中構造理論底狀況”一書已在蘇聯出版

本刊二卷三期曾刊出“蘇聯化學界對化學構造理論‘共振學說’的批判”的專輯，比較詳盡地介紹了關於蘇聯化學界對於化學構造理論的討論。今得譯者龔育之同志來信，謂“有機化學中化學構造理論底狀況”一書已由蘇聯科學院於1952年出版。該書是1951年6月大會的速記記錄，全文包括切列寧院士底報告和四十三位學者的討論發言，其中有八人發言兩次，另外還有十五位學者的書面意見。討論之後，切列寧又作了總結。書中還包括杜賓寧院士底開幕辭與結束語、蘇聯科學院院長涅斯米楊諾夫致大會的信件、大會底決定與討論決定的記錄，大會給斯大林同志的致敬信：總共四百餘頁。

切列寧底報告分為八節：“波特列洛夫學說及其在化學發展中的作用”、“十九世紀下半葉與二十世紀初構造理論底發展”、“蘇維埃有機化學底成就”、“量子化學與構造理論”、批判所謂“共振論”、“批判幾位蘇維埃學者的錯誤”、“波特列洛夫——馬爾考夫尼考夫關於分子中原子相互影響及反映性能的學說底現狀”、“構造理論向前發展的遠景”：共七萬餘言（其中第七節佔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一）。已經譯出了的留托夫底述評（本刊三卷三期）大體上是根據這個報告縮寫的，原報告則詳細得多，特別在具體化學內容方面。現在，龔育之同志正在翻譯切列寧底報告，並且還預備把該書底其他部份摘要譯出。謹此預告關心這一問題的讀者同志。